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Edited By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美〕特伦斯·鲍尔 〔英〕理查德·贝拉米 主编

任军锋 徐卫翔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Edited By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美〕特伦斯·鲍尔 〔英〕理查德·贝拉米 主编

任军锋 徐卫翔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 (美) 鲍尔, (英) 贝拉米
主编; 任军锋, 徐卫翔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1596-4

I. ①剑… II. ①鲍… ②贝… ③任… ④徐…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世界—20世纪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美〕特伦斯·鲍尔 〔英〕理查德·贝拉米 主编
任军锋 徐卫翔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596-4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4 1/4

定价: 118.00 元

Edited By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opyright © 2003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

目 录

本书作者	1
主编致谢	3
主编序言	5

第一部分 自由民主的得时与失时

第一章 福利国家的来临	迈克尔·弗里登	11
第二章 政治与市场:凯恩斯及其批评者	韦恩·帕森斯	43
第三章 大众的出现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	理查德·贝拉米	65
第四章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	詹姆斯·梅奥尔	94
第五章 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主义	斯坦利·佩恩	111
第六章 保守主义	诺埃尔·奥沙利文	134
第七章 基督教民主	马里奥·卡恰利	146
第八章 极权主义的批评者	杰弗里·伊萨卡	159
第九章 福利国家的终结?	罗伯特·古丁	178

第二部分 马克思主义种种

第十章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	迪克·吉尔里	193
第十一章 俄国革命: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尼尔·哈定	210
第十二章 亚洲的共产主义	戴维·麦克莱伦	231
第十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	戴维·麦克莱伦	243
第十四章 法国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	森尼尔·基尔南尼	257

第三部分 科学、现代主义与政治

第十五章 实证主义:反动与发展	梅利莎·莱恩	275
第十六章 后现代主义:从尼采到后结构主义者的现代性病理学	彼得·迪尤斯	294
第十七章 韦伯、涂尔干和现代国家的社会学	小安东尼·帕隆博 艾伦·斯科特	314
第十八章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	保罗·罗艾森	334
第十九章 艺术、文学与政治理论中的现代主义	沃尔特·亚当森	351
第二十章 新政治科学	詹姆斯·法尔	369
第二十一章 功利主义及其他:当代分析政治理论	戴维·米勒 理查德·达格尔	383

第四部分 新社会运动与差异的政治

第二十二章 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	马丁·锡达尔	405
第二十三章 女性主义种种	苏珊·詹姆斯	422
第二十四章 身份政治	詹姆斯·塔利	441
第二十五章 绿色政治理论	特伦斯·鲍尔	454

第五部分 超越西方政治思想

第二十六章 非西方政治思想	比库·帕雷克	471
第二十七章 伊斯兰政治思想	萨尔瓦·伊斯梅尔	493
第二十八章 结语:二十世纪总体的两分法	史蒂文·卢克斯	511

主要人物小传		532
参考文献		591
主题索引		665
人名索引		688

本书作者

沃尔特·亚当森 (Walter L. Adamson)

埃默里大学塞缪尔·C.多布斯讲座历史学教授

特伦斯·鲍尔 (Terence Ball)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理查德·贝拉米 (Richard Bellamy)

埃塞克斯大学政府学教授

马里奥·卡恰利 (Mario Caciagli)

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马丁·锡达尔 (Martin Ceadel)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牛津大学新学院研究员

理查德·达格尔 (Richard Dagger)

亚利桑那大学巴雷特学院政治科学教授,哲学、政治与法律研究项目主任

彼得·迪尤斯 (Peter Dews)

埃塞克斯大学哲学教授

詹姆斯·法尔 (James Farr)

明尼苏达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迈克尔·弗里登 (Michael Freedon)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员

迪克·吉尔里 (Dick Geary)

诺丁汉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近代史教授

罗伯特·古丁 (Robert E. Goodin)

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与政治理论和哲学教授

尼尔·哈定 (Neil Harding)

斯旺森威尔士大学政府学教授、安·阿伯尔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杰弗里·伊萨卡 (Jeffrey C. Issac)

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詹姆斯·H.鲁比讲座政治科学教授

2 本书作者

萨尔瓦·伊斯梅尔(Salwa Ismail)

埃克斯特大学中东政治资深讲师

苏珊·詹姆斯(Susan James)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哲学教授

森尼尔·基尔南尼(Sunil Khilnani)

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研究院南亚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

梅利莎·莱恩(Melissa Lane)

剑桥大学历史学大学讲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百年纪念讲座社会学访问教授

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理论教授

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

剑桥大学帕特里克·希伊爵士讲座国际关系学教授

戴维·米勒(David Miller)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

诺埃尔·奥沙利文(Noël O'Sullivan)

赫尔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小安东尼·帕隆博(Antonino Palumbo)

巴勒莫大学研究员

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

伦敦经济学院百年纪念讲座教授

韦恩·帕森斯(Wayne Parsons)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与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公共政策教授

斯坦利·佩恩(Stanley G. Payne)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希尔达尔-乔姆·维森斯·韦弗斯讲座历史学教授

保罗·罗艾森(Paul Roazen)

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荣休教授

艾伦·斯科特(Alan Scott)

因斯布鲁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

多伦多大学哲学研究 N.R. 杰克曼讲座杰出教授

主 编 致 谢

本书是“剑桥政治思想史”这一鸿篇巨制的最后一卷。从1993年拟订写作计划至今,本卷的写作前后耗时十年。我们首先应当感谢本卷的各位作者,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共同完成这部大书。许多人肯定一度怀疑此书能否与读者见面。我们非常感谢本书的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查德·菲舍尔(Richard Fisher),是他最早找到我们商谈有关本卷的主编事宜,并一直督促我们,而我们也不断督促各位作者。大家谦恭自处,彼此尊重,因而能够深入交流。

在本卷修改和编辑的最后阶段,我们得到了查兰·奥凯利(Ciaran O'Kelly)许多非常有益的帮助,许多读者曾就不同章节提出过修改意见,版本编辑弗朗西斯·纽金特(Frances Nugent)尽职尽责,朱迪斯·鲍尔(Judith Ball)整理了索引。最后,我们两位主编都要相互感谢彼此给予对方的愉快合作。

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

主编序言

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的最后一卷，本书旨在对 20 世纪的主要社会和政治思想思潮做一概览。对任何一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介绍都有相当的难度，而要对 20 世纪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的演化做出考察则更为困难，因为在刚刚结束的世纪，在如何讲述历史这一问题上弥漫着一种怀疑论调，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还有其他许多建构历史的途径。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怀疑式的解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怀疑论已经波及到历史写作包括本书的写作。首先，针对意识形态偏见的疑虑肯定会出现，而且由于本书的各位作者是在讲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这就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们还可能会问，为什么收入某些主题和思想家，而将其他主题排除在外。而且同样还始终存在方法的问题：为什么选择现在的讲述角度而不是另外的角度？为什么运用这一方法(或方法论)而不是其他方法？

对于这些难题，应当承认，我们并未做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不过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澄清：首先，毫无疑义，本卷的编者和各位作者都有各自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立场，而这无疑会影响到我们的写作内容以及写作方法。然而所幸的是，我们在政治倾向上并非一边倒，也并非都服膺某一种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读者将不难发现，不仅本卷所讨论的话题多样，而且(我们希望)讨论问题的方式即使不是完全“客观”，也是相当多元和持中的。让人感到遗憾，但也难以避免的是，对于某些思想家和论题的讨论更加详细，而许多思想家和论题则完全被排除在外。这种选择性之所以无法避免，在于我们受到字数限制，在对思想家和主题的遴选上，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面面俱到，力戒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最后，就方法来说，有必要指出的是，本卷并不局限于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在我们看来，最好将我们的方法说成是折中式的，即依据各章所涉及的思想家、问题以及主题采用适当的方法。本卷各章主要围绕论题展开，一般以年代为序，偶尔也聚焦于某一特定的理论家。总体上说，每一章集中讨论一个主题，该主题贯穿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段。不过也会有例外，当一位理论家与某一特定的观念或思想流派有着显著联系的时候，或者某一主题

非常重要,需要分章讨论,有的是由于该观念或思想流派的影响广泛且深远,有的则尽管持续时间很短,却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

不过,我们承认,写作政治思想史这一努力本身会导致某些无法克服的扭曲。尽管我们力图做到海纳百川,但目录设计和字数限制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取舍,这些取舍肯定会引来争议,有时甚至是武断的。既然是历史,我们始终极力避免以现在的立场去评判某些观念对今天的我们是否具有意义和是否重要,而是从它们在所处时代的意义中获得启示。由于我们关注的是政治思想而非实践,因此,我们着墨更多的是那些在理想(而非现实)政治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理论,尽管理想与现实是密切联系的,而且本书的作者们都试图考察两者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聚焦的政治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因此与本丛书前几卷的编者一样,我们在确定论题范围和性质的过程中往往遇到许多困难。

在 20 世纪,这些问题尤为敏感,因为就“政治”的范围曾有过激烈的论辩,并常常被不断扩大,以至包容了极其众多的主题、思想家以及论题的门类。我们的出发点在于:20 世纪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各种意识形态构成了政治思想的主要语汇。然而,作为政治思考的模型,我们很难将意识形态与其型塑或受其型塑的政治事件割裂开来考察。同样,与此相关,随着那些被认为是政治现象的范围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特性变得破碎和复杂。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长期以来作为政治思想聚焦核心的国家,如今却被公认为只是众多行为主体之一,其他行为主体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地区和全球贸易组织、人权观察机构、国际救援组织、以及跨国性的妇女政治运动、环境保护等其他组织。因此,什么属于或什么不属于“政治的”范畴决定着“政治思想”的范围,而政治思想本身的特性仍然是个问题。移民、国际贸易、环境保护、人权、恐怖主义、文化认同、社会科学和美学领域日新月异的语汇、新社会运动、不断变化的国家和社会构成,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发展趋势共同决定了现代(以及有争议的后现代)政治思想的特质。因此,我们考察了环境和妇女运动的兴起,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反西方和反自由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学科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其中的多样性即使不是在政治角度,仅从编辑的角度而言,其程度也是空前的、难以想象的。最后,与前几卷一样,本卷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即便如此,在 20 世纪,随着西方的扩张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与非西方在政治语汇和政治传统方面的互动和彼此影响得以增强,这就使“西方的”这一限定词被大打折扣。这种跨国和跨文化影响的例证不胜枚举:例如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

eau)对甘地的影响,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以及环保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列宁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对欧洲和南美极左运动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要么被非西方传统窃用,要么遭到该传统的责难,例如一方面是毛泽东和甘地,另一方面则是反殖民和伊斯兰运动。

为了能够与前一卷内容保持衔接,本卷有时涵盖了前一卷未能涉及的内容,有时(或许不可避免)溯及19世纪。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一百年只是一种编年习惯,而非无所不包、毫无重叠的封闭的单元。因此任何针对政治思想史(实际上其他一切皆如此)的分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的;我们之所以回溯到19世纪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20世纪政治思想中的许多议题在前一个世纪后半叶业已确定。因此,我们大致从1880年开始,这时欧洲主要国家基本上确立,并由此开启了自由制度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代,帝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现代大众民主开始形成,妇女争取普选权运动以及现代福利国家对一种社会民主式中间道路的探索。我们采用的第二个断代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俄国革命、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大萧条所导致的经济混乱,最终酿成纳粹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分界点是冷战的到来、去殖民化以及各欧洲帝国的终结、带有过分渲染和自夸色彩的“意识形态终结”,接着是意识形态、终结的终结,包括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的没落,保守主义的复兴、通常与原教旨主义复兴相联系的新部落主义滥觞,以及福利国家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外双重压力下所面临的危机。

将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想、鼓吹一种辉格派的(或某种程度上黑格尔式的)对20世纪政治思想的描述。实际上,几乎很少有人会认为20世纪或者20世纪的政治思想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恰恰相反,20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其中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规模杀戮、种族灭绝以及核战争威胁。正如俄国革命领袖托洛茨基以一种异常婉转的口吻指出的:“任何渴望安居乐业的人要是生在20世纪那可是倒大霉了。”21世纪和新千年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趋于平静、更少暴力,仍然是个疑问。假如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能够有所预示的话,那么前景看来并不乐观。

第一部分

自由民主的得时与失时



第一章 福利国家的来临

迈克尔·弗里登

20 世纪前半叶,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在于建立福利国家。7 这种福利国家是有关福利和国家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结果。随着某些对于人性以及个人与社会依存关系的新观念的出现,人们尝试各种结构性实验,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有关权利、义务、责任和行动的伦理上和概念上的诠释。尽管这些新观念在各种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发展,却也在观念上表现出某些交叠且复杂的形态。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差异不仅导致关注点上的某些重要差别,并且表明了共同观念得以运用,此类地方性分野也往往源自共同的观念基础。

意识形态分歧

20 世纪中叶是福利国家的极盛期,人们往往这样理解福利国家:即有目的地运用民主国家的权力以规范和修正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自发作用,从而影响收入的再分配(Schottland 1967, p. 10)。这一界定以及其他类似的理解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诠释:即认为国家操纵市场使其偏离轨道,而在早先福利机制中并没有类似的“修正”或干预,这两种预设都难以自圆其说。上述界定未能区分保障性福利与救济性福利,即旨在确保最低生活条件的福利与广义的旨在使人们生活富足(甚至最佳)的福利,¹ 未 8 揭示美国式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法国式福利国家(l'état providence)以及德国式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之间的差别,也未能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而没有这种视角,20 世纪的福利国家思想便难以索解。从根本上说,这种经济的和物质主义的界定远不能表达福利思想家们希望实现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即使那些坚持经济立场的福利思想家也不例外。在许多人看来,民主是福利的前提,尽管福利

1 用最佳(optimum)取代最低(minimum),可参看 Briggs (1961)。